

“三生”共赢:绿色发展的逻辑契合和实现路径^{〔*〕}

○ 李 娟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稳态经济和生态中心主义曾经是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这两类激进的环境主义观本质是将自然与人类、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理论和现实均证明行不通。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是交互衔接的有机整体,缺少任何一个,其他两个都不能实现。其中,生产发展是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社会动力,生态良好是必要条件。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科学指明了生态文明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必须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壮大低碳循环产业体系;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推进生态产品供给侧改革;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关键词〕“三生”共赢;逻辑契合;实现路径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6.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面指明了生态文明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内涵和正确方向。本文通过证伪稳态经济、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激进的现代环境主义观点,论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的逻辑契合与耦合互动机制,并阐释我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的具体路径。

作者简介:李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多维机制研究”(17CKS020)的阶段性成果。

一、对两种激进环境主义的回应与批驳

环境问题首先产生于工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承受力关系的探讨层出不穷。其中稳态经济和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观点因其大胆悲观的社会预言和极富感染力的生态呼吁,在现代环境主义流派中备受瞩目。在此,笔者对这两种激进观点予以回应,为阐释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的关系,首先澄清两种流行的错误认识。

1. 难以维持的平衡:稳态经济的社会悖论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赫尔曼·戴利《走向稳态经济》认为,世界上可耕种土地、能源储量和污染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因而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人类社会实现永续发展就要遏制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在预测人们基本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将经济规模收缩控制在某一范围之内,此后便维持经济零增长的稳定状态,以使人类生产消费的物质流与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稳态经济的观点也得到了阿格尔、威廉·莱斯、萨拉·萨卡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可,他们在稳态经济的前提下建构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降低社会生产率;拆除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发展小规模技术,甚至以手工劳动代替现代化大生产;人们必须学会“承受比今天还低的生活水平”^[1]。

稳态经济提醒人们在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但是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从社会发展逻辑而言,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阐释,未来社会最终将走向社会化集体大生产的共产主义,稳态经济所提倡的是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经济单位,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从社会现实而言,因人口寿命延长等原因,世界人口的数量在增加,从而对经济总量的需求也在增长,如果只求产品产出和经济的零增长,则根本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更何况稳态经济还要求减少现有的经济规模,罗斯科等要求减少10倍。^[2]我们完全可以预计,当这种减少开始时,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厂、机器和工人将面临多余过剩状态,紧接着就是一个伴随着高失业率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犯罪率飙升的社会动荡。第三,从伦理道德而言,全球贫富悬殊巨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尚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如果要求他们保持经济零增长,那些拥有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看不到解决温饱问题的希望。因此,只能公正地说,稳态经济是一种野蛮理论。“它否认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对一种合乎人生活要求的平等权利。它要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宣判到野蛮人的物质水平上,而其他,即‘幸运的少数’,也被宣判到野蛮人的道德水平上。”^[3]事实上,那些赞成稳态经济的学者最后也承认稳态经济的措施很难奏效,因为生态系统异常复杂,我们无法精确计划与生态环境承载完全匹配的经济发展规模控制在何种程度是最适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做出必然成功的承诺,尽管必然性要求一种稳态经济模式适应,但是人类社会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4]

2. 强批判与弱建构:生态中心主义的反人道立场

生态中心主义是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而言的。辛格认为,其他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知觉、情感等感受能力,只是不能由言语来表达,因此所有动物个体都具有构成生命快乐的利益;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奈斯等以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个生物都是生态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每个生物都有其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比如热带森林,即使人类从不去光顾它,它的存在价值依然如故”,^[5]因此,相对于其他存在物来说,人类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没有理由高居于自然之上成为自然之价值的仲裁者,人类必须摒弃控制自然的科技工具和工业生产。

表面看来,生态中心主义站在整体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和评定人的价值,以此来消解人对自然的支配地位,具有合理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一看似深刻的生态伦理却是一个走向极端的虚假命题。首先,生态中心主义放弃人类主体地位,最终是把人类推向坟墓。生态系统中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如用尖齿利爪来捕食,或有厚皮丰毛来御寒。但是,人类在这些方面都“先天不足”,如果坐等大自然的恩赐,完全听任自然摆布,无异于倒退至荒蛮时代,甚至人类会被猛兽吃掉。退一步说,承认动物可以按照需要捕食其他动植物,而单单要求人类无条件放生,这也是不公平的。其次,生态中心主义抹杀人的社会性和能动性,实际是否定人类保护生态的权利和能力。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意识与理性思维能力。“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6]“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7]“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正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地球才因此变得丰富多彩。因此,人类既然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类存在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竖起“人类中心”的大旗,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应该承担的义务,包括保护其他物种、维系生态平衡等。实际上,如果把人类从“中心”降格到普通物种的地位,却又要求人类肩负起“中心”应有的关心其他物种生存权的道德义务,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诚然,囿于认识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但是人的发展就是不断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克服局限性和盲目性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9]人类终会逐步地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由王国飞跃。

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耦合互动机制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从自然汲取生产生活的物质能量,又将新陈代谢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返还给

自然,如此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循环圈。所以,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必须做出衡量取舍的问题,而是缺少任何一个,其他两个都不能实现。

1. 生产发展是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一切现实问题从根本上都源于物质经济基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0]“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11]理解和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也不例外,依然需要由直接的经济动因来阐释说明。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建构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直观反映了经济状况与环境质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该曲线显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主要以人均收入为指标)呈现倒U型关系,即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增加,一旦经济增长水平越过某个发展阶段后,环境退化的趋势便得到抑制,此后环境质量则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向关系。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就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示过程。可以说,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雄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发达技术手段、环境民主意识和系统法律法规。反之,发展中国家的诸多案例证实,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比如,一组对墨西哥2400个自治区的研究数据发现,当地森林覆盖率迅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贫困,贫困程度越高,损失的森林覆盖率就越大。^[12]联合国环境署精辟总结,非洲“许多游牧民族不该称为沙漠之子而简直应该称之为沙漠之父”^[13]。对此现象,学者做出解释:相对于富裕地区,贫困地区的生计和发展更依赖于自然资源,落后的技术手段、粗放的发展模式与掠夺型的资源开发方式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14]穷人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投资于见效慢的生态环境管理。^[15]结果,环境破坏的自然制约产生了更大的贫困,学者将这种贫困与环境之间相互依赖与相互强化的螺旋下降过程称为“贫困陷阱”^[16]。我们可以通俗地将之理解为“贫困是最大的污染”。可见,稳态经济和生态中心主义关于限制经济增长的设想不仅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反而会加剧环境危机。在此,进一步证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不与生态环境相对立,而且还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实力谈高标准的生态环境无异于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观照我国现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对于这部分地区的发展,以贵州为例,“有人说,贵州生态环境基础脆弱,发展不可避免会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发展要宁慢勿快,否则得不偿失;也有人说,贵州为了摆脱贫困必须加快发展,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难免的、必须的。”^[17]强调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是对的,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但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环境

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如果环境主义者畏畏缩缩,害怕闯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领地,那么他们就将进入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18]当然,经济发展也不会自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投入(包括环境资源)和产出(包括污染物)的构成。这就涉及如何发展或者说发展方式的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分的具体路径中予以详细说明。

2.生活富裕是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社会动力

所谓生活富裕,是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上的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马克思和马斯洛的需要理论都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不同层次构成的从低至高的系统。生存需要是最基本需要,“为了生活,首要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9]一旦人的物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新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需要满足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0]这种新需要“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21]。

生态环境具有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的功能。从最低生存需要而言,“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人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22]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无机的身体”。从高级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而言,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受“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23],比如,优美怡人的自然景观使人心情愉悦、神清气爽。“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4]比如,牛顿从苹果下落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国家体育场“鸟巢”建筑就是从鸟类营造巢穴得到的启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富裕生活侧重于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程度。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部分城市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富裕生活体现为物质丰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等全面小康的满足程度,尤其是在全球环境危机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放心的食品、优美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25]也就是说,社会需求调节社会生产,催生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新手段和新产品,比如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推动了纺织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如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对水、空气、生活环境等自然生态的高层次享受需求,这将促进市场生产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清新空气、干净水源、绿色食品、宜居环境等,“这些潜在的需求如果能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

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26]因此,生活富裕既能在经济方面促进消费升级和生产发展,而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生活富裕还通过提升人的素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关于收入对自然环境的正面影响,这一点已经在国内外很多研究中得到证实。Buttel and Flinn^[27]认为,收入越高,环境关心越多;英格尔哈特^[28]认为,当人们逐渐富裕起来后,从原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移促进了公众环境参与;沈俊毅^[29]、洪大用等^[30]对我国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也表明,环境关心与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3.生态良好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开宗明义,“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人类生产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如果没有自然界为劳动者提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and 活动场所,人类就什么都不能创造,这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1]自然生态还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32]一般而言,自然素质与劳动生产力存在“同义反复”关系,如土地肥力差别造成同量劳动收成不等量的农产品。

纵观人类文明最初起源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明的发祥地无一例外都孕育于大河流域。这绝非偶然,因为大河流域地区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田野肥沃、气候温暖,这种自然的恩惠使得人们在为获取生活资料所花费的简单劳动之外,还有闲暇时间去从事别的劳动,如制造弓箭、石刀、独木舟之类的工具,进而运用这些物质手段生产出更多产品。“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33]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文明就是在此剩余劳动基础上得以发展进步。相反,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等上古文明的衰落与消失也与其自然条件直接相关。过度伐木垦荒和盲目灌溉导致了不可逆转的荒漠化和盐碱化,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原本富饶丰茂的地区成为不毛之地,早期文明古国的政治历史和它的城邦紧随着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和农业基础的瓦解而结束。早期人类文明兴衰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自然前提,“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对自然界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外在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34]这种决定性意义体现在工业生产的全过程,就原料而言,丰富的自然资源降低不变资本,机器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铁、煤炭、木材等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丰度,并且是一个不以

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因素”^[35];就生产进程而言,产业机器不是在真空中运行,必须考量自然动力因素,这些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巨大自然力被大工业和自然科学并入机器体系,同机器体系和社会劳动“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36],联合作用于提升生产效率。马克思将这种自然有助于生产发展的能力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互交织、相互依存,构成全面完整的生产力概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突破了以前单纯重视社会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观,是对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的深刻把握,是对生态良好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必要条件这一观念的精辟概括和理论提升。

三、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的实现路径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三生”共赢不仅具有理论可行性,而且具有现实必然性。全面考虑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活富裕的时代需求和生态良好的行为导向,笔者提出实现“三生”共赢的几个主要路径。

1.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壮大低碳环保产业体系

如前分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三者之间是必要而非充分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发展提供了物质可能,但并不自动实现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37]生产发展与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传导中介,不是不择手段发展生产的物质积累结果,而是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化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8]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工具对于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力发展、劳动组织形式起着决定性作用,“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39]。因而,归根结底,实现“三生”共赢、变革生产方式的核心就落在创新生态化生产工具的问题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在自然力这个不变资本上开展两类技术改进,可以达到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双重目的。一是废物资源化,将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再次作为原料进入生产过程,“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40]二是生产减损化,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最大限度减少生产排泄物,“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41]马克思的技术改进思想为我们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大力创新节能减排技术,实现清洁生产,降低能耗、物耗以及废物排放;要大力创新循环再生技术,减少生产新产品对新资源的索取。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的节约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42]成本的节约“与其说是并纱方法(技术)本身改良的结

果,不如说是机器集中管理的结果”^[43]。因此,绿色生产绝不是实行稳态经济所倡导的小规模分散技术,相反,要发展高新绿色技术产业集群,在全产业链规模经济中降低绿色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成本,促进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扩散,从而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绿色生产。这也是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的原理所在。

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技术不仅涉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是推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绿色技术在当今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越来越突出。以德国为例,节能环保产业是德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产业,2030年德国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1万亿欧元,届时将超过机械、汽车等成为德国第一大行业。^[44]可见,大力发展绿色科技不仅是推动产业转型、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手段,还是生态文明新时代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2. 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推进生态产品供给侧改革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说:“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45]“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46]当前,与一般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相比,我国生态产品的供给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生态产品的短缺成为制约人们小康生活的最大瓶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表明中国政府顺应民众呼声,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将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问题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

关于生态产品的定义和范围,总体而言,学界沿着两条主线开展研究。一条主线是将生态产品界定为生产消费过程中能够保护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诸如我们日常所说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高效节能类产品都属于这类意义上的生态产品。另一类是将生态产品视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文件)指出:“从需求角度,这些自然要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产品的性质”,并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产品,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茂盛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根据这两类定义,笔者认为推进生态产品供给侧改革、实现“三生”共赢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坚持保护与治理相结合,促进公共生态产品优质供给。生态空间是生态产品的“主产地”“富集区”,必须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尤其是加强保护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关系国家基本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保证生态产品永续稳定供给。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打好空气、水源、土壤的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系统等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持续推进绿化造林,提升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第二,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相结合,促进市场生态产品高效供给。一方面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把绿色标准贯穿于采购、设计、生产、制造、工艺、运输、销售等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发展生态现代化经济体系,丰富生态产品的供给结构。另一方面,把握人们对优质高端生态产品的绿色消费需求,创新发展新兴生态产业。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要充分依托环境禀赋,把生态产品作为核心竞争力,促进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要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搞绿色种养等方式,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走出一条“生态”与“产品”高度融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好路子。

3.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一个严格的社会生物学模型中,追求财富最大化是行为人的一个潜在动机,为了克服人类行为自发性、无序性和盲目性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旨在规范相互关系并使组织和个人行为变得更可预见的制度应运而生。同样地,人类社会发展并不会自动实现生态文明,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而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累积才产生的环境问题往往被忽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绿色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近年来,我国修订完善了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47]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问题。因此,保障我国“三生”共赢的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是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通过健全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等,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执政的重要导向。

诚然,正式规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秩序,但在日常互动中,它们很少是形塑选择的明确而直接的来源,且社会越是多样复杂,规则的实施成本越高,群体也就越倾向于采取其他非正式约束的便利方式。习俗、观念、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它们提供一种认知体系,这种认知体系影响人们的信念,而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非正式约束还通过文化渗透成为正式制度演化和社会变迁的传统根源。非正式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和文化遗产,故此,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和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环境参与的良好风向,在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和社会行动的多元共治

体系中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良性互动和“三生”共赢。

注释：

- [1][2][4][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8、204、289页。
- [3][18][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0、201页。
- [5][英]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宋玉波、朱丹琼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 [6][19][20][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531、531、210、191、161、223页。
- [7][8][9][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560、548页。
- [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600页。
- [12] Ravallion M, “Why don’t we see poverty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1), pp.504—523.
- [13][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 [14] Milbourne P, “The geographies of poverty and welfare”, *Geography Compass*, 2010, 4(2), pp.158—171.
- [1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i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6] Bhattacharya H, Innes R, “Incom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ural India: Is there a poverty trap?”, Part of the UC Center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1.
- [17][26][45][46][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25、4、8、110页。
- [27] Buttel, FH and Flinn, WL, “The Structure of Support for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Rural Sociology*, 1974(39), pp.56—69.
- [28] Inglehart, Ronald,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Impact of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5(28), pp.57—72; Inglehart, Ronald,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9] Junyi Shen and Tatsuyoshi Saijo,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concern: Evidence from Shanghai dat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28), pp.42—50.
- [30] 洪大用、肖晨阳等：《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 [31][32][33][34][36][38][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3、586、586、487、210、210页。
- [35][40][41][42][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115、117、118、114页。
-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7页。
- [44] Edgar Endrukaitis：《德国环境工业的发展》，《环保产业国际研讨会报告文集》，2003年，第67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